

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

——曲啸谈理想与追求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 编
南开大学图书馆期刊部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

——曲啸谈理想与追求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 编
南开大学图书馆期刊部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

1088238

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

——曲啸谈理想与追求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

南开大学图书馆期刊部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6千 印数: 23,000

统一书号: 3301·3 定价: 0.80元



写在前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个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获得了做人的权利，他，就是被人称为“真正牧马人”的曲啸同志。曲啸自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有着和电影《牧马人》的主人公许灵均相似的经历和遭遇。但是，无论下放劳动改造，还是在铁窗高墙之内，他一直相信党，坚信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了做人的权利之后，对过去不公正的待遇他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更加相信党，更加勤奋地为党工作，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追回已经逝去的岁月。他的事迹被广播和登报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上至白发老人，下至戴红领巾的少年，都为之感动，视为楷模，这说明他的事迹确实具有对全社会进行教育的价值。为了便于广大读者了解曲啸同志的事迹，学习他的精神，我们将他的讲演稿以及有关报刊上对他的事迹报道的文章汇编成册，献给读者。

收入本书的文章，除曲啸同志的讲演稿外，大都选自《光明日报》、《辽宁日报》、《山西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共产党员》、《高教战线》等报刊，因涉及的报刊较多，恕不一一注明出处。为了编排的需要，个别文章收录时做了必要的改动，部分标题作了适当的调整，其它均保持发表时的原貌；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编排时尽量将同一类型的文章放在一

起。

本书由夏家善、刘竞华、王淑贵、李伦、薛礼同志负责
编选。

由于水平所限，接触材料也不够全面，编选工作难免会
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
南开大学图书馆期刊部

1985年10月

目 录

写在前面

- 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 曲 啸 (1)
- 关于理想信念党性道德的谈话..... (54)
- 曲啸答《共产党员》记者问
- 理想之火永不熄灭..... (58)
- 曲啸同志答青年问
- 曲啸与未见面朋友谈心的书信 (选登) (64)
- 我为我是教师而自豪..... 曲 啸 (79)
- 党啊, 我的母亲..... 曲 啸 (81)
- 曲啸同志的“入党申请书”..... (83)
- 曲啸同志的“入党志愿书”..... (85)
- 我要不断克服缺点, 力争做个名副其实的
共产党员..... (88)
- 我为什么介绍曲啸入党..... 李焕桥 (90)
- 盛名之下..... 史 航 (92)

理想之光..... 史卫国 (113)

——访曲啸同志

爱之路..... 陈 颂 易运文 (126)

——曲啸纪事

人不可没有精神支柱..... 陆薇薇 (137)

——访“辽宁牧道人”曲啸

*

*

*

敬党惟有一寸丹..... 关永民 (139)

——记与曲啸老师相处的几个片断

敢斗邪风捍党风..... 李 丹 (143)

他有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 曲贵良 (145)

为了挽救失足的孩子们..... 赵敬泽 (147)

*

*

*

曲啸的事迹具有对全社会教育的价值..... 鲁正新 (149)

人民钦佩他..... 修国金 史 航 (152)

——曲啸的事迹传开后

象曲啸同志那样对待生活..... 谭 军 (156)

我懂得了人的价值..... 梁 涛 孟繁光 (159)

我们农民也赞扬这样的知识分子..... 黄平远 (161)

学习曲啸三题..... 成保德 (162)

(83)

(84)

(85)

(86)

(87)

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

曲 啸

今天能有机会到天津师范大学来同大家见面，向同志们学习，我很高兴！我代表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的全体教职员向同志们问候！为你们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在各自的岗位上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

看到在座的大学生们，正是青春年华，朝气蓬勃，又赶上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改革的年代，真是令人羡慕！我记得，魏巍同志在他的《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青春是美丽的。但一个人的青春可以平庸无奇；也可以放射出英雄的火光。可以因虚度而懊悔；也可以用结结实实的步子走到辉煌壮丽的成年。”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青春的时光呢？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更有意义呢？我想就这个问题，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个人的认识。我的水平有限，在我的发言中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各位多加指教。

我出生在旧社会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我的童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度过的。解放后，是共产党用助学金把我一直培养到大学毕业。通过党的多年教育，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我愿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人生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即使

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在生命的旅途上也会遇到许多曲折和不幸。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这一切呢？我自己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人活着应该有一个信念，应该有一个理想。邓小平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大家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其中有理想、守纪律，是最重要的两条。当然，每个人在生活的道路上都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怎样去鉴别这个理想有无价值呢？我认为，一个人的理想应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应该和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理想，这样的人生的追求，才能说是有意義的。心理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的理想越大、越坚定，在内心里焕发的驱动力越强，这种驱动力就能推动自己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从而达到胜利的彼岸。反之，一个人的追求若是和个人的私利联系在一起，脱离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这种理想是渺小的、短浅的，在内心里也不会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力量。尽管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手段达到了，但在我看来，实在没有多大价值。

我是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一九五七年那年，我刚毕业八天就赶上了反右斗争。我在这次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我是想不通的。我怎么会反对培养我成长的党呢？我记得给我强加的罪名有三条：第一条就是我在大学四年级一次课堂讨论会上，对国际形势问题发了一次言。我说，苏联开过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到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这个行动的本身和一九四八年国际情报局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精神是不一致的。因此，我认为苏联二十大之后，外交政策有新的动向。大学生的课

堂讨论嘛，本来就应该是有啥说啥。没想到在反右派的时候，我在课堂讨论时的发言却成了罪状，说我诬蔑苏联外交政策，而且在批判我的时候，还挖出一条“思想根源”，说我有“杀父之仇”！现在的青年人，不大知道“大批判”是怎么回事，那时的“大批判”是蛮不讲理的。先给你定个罪名，然后弄几个人给凑凑材料，在会上上纲上线地胡诌八扯地狠批一通，不管是不是事实，只要经过大会这么一搞，就算“证据确凿”了，于是你就得按照给你扣上的这些“罪名”写坦白交待材料，稍一辩解，就是态度不老实，罪上加罪。为什么从反右之后造成那么多冤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那种左的错误，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说我有“杀父之仇”是怎么回事呢？一九五一年过年那天，我父亲走在大街上，被苏联汽车轧死了。肇事的汽车连停都没停就扬长而去。事情发生了，怎么办呢？我是个共青团员。当时中苏关系又是友好的。这件事总不能因为个人利害而影响国际关系的大局吧！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和我母亲虽然悲痛，但是，没有向任何方面提出任何要求，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把老父亲埋葬了。我觉得在个人家庭遭到这样惨痛不幸的情况下，我能以国际关系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作为党教育下的新中国的青年，我已经做到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如果说要遵守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话，我已经做到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没有想到这件事在反右派斗争中却成为我的一条罪状。这怎么能让人想得通呢？

第二条就是我和一位教授的关系非常好。他是研究心理学的专家，是我的老师。他非常喜欢我，我也非常尊敬他，于是平常比较接近，向他求教的机会也就多一些。反右派斗

争当中，这位老教授被错划为右派。现在虽然纠正了，可是他老人家已经故去了。当时逼着我揭发他。这位老师平时没有对我讲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我怎么揭发呀？在运动当中，我总不能因为我是共青团员要表示表示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没有的事也给人家安上去，那该多缺德呀。党也没告诉我做那种人啊！所以我拒绝揭发。一拒绝，好！加上一条：“包庇右派”。说我包庇就包庇吧。反正我不知道的事，我不能胡说八道，对别人负责，对自己也要负责。

再有一条，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干部，他吃饱了撑的，没有事干，拿女同学做人身试验，最后把这个女同学吓成精神病了。我心里很气愤，我坚决主张对这个干部给予组织纪律处分。因为我提了这个意见，就把我说成坚持惩办主义，反党。

结果，这三条就成了定我“右派”的罪状。召开团支部大会，开除我的团籍，最后让我表态。当时思想确实不通，我内心里从来没有想过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呢？但是，不通也得表态。我说：组织上既然已经决定开除我的团籍，我保留意见。我对同学们说，在我离开培养我多年的团组织，离开同志们的时候，我心情是沉重的。我希望能若干年以后，我们再见面时，彼此能于心无愧地告诉对方，毕业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每人为祖国都做了些什么。我流着眼泪离开了团组织，也离开了母校。

离校后，我被分配到辽宁省新民县的师范学校。因为我思想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党的概念，又是新走上工作岗位，所以，我仍然满腔热情地工作。加上我热爱体育活动，青年

同学们都比较愿意和我接近，没想到这又是一条罪状。

学校有位领导问我：“现在同学管你叫老师，而且愿意和你接近，是吗？”我说：“对。”他把脸一沉说：“你这是和我们党争夺青少年，这是改造态度问题。”不容分说就把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我当时想，学生不管我叫老师叫什么呢？学生接触老师，我有什么错呢？这也成了罪。我想，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反党。我才二十四岁，身体又好，去劳动几天出来，照样可以做老师，而且我要做出个样子给你看看！这样我就打起行李卷儿，主动到教养院报到去了。青年人考虑问题比较简单，我想到那里去不就是劳动吗？劳动完了，就回来了。其实，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这一进去可就不能随便出来了。这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的事。

当时，我干的活儿，主要是耙地、种稻。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虽然我不应该进这里来，但我通过劳动体会到了种稻子并不是容易的事。东北的四月里，天气还是很冷的，腿在冷水里泡着，被风一吹，就裂成血口子，钻心的疼。通过劳动我真正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所以现在我们家吃饭，任何人不能丢掉一粒饭粒。孩子吃饭丢掉一粒米，就是跑到了街上，我也得把他叫回来，让他吃了。我说：“你知道你爸爸当年种稻子是什么滋味吗？”我们现在有些大学生吃大米饭，半碗半碗地倒掉，吃馒头还剥皮，浪费得很，我很心疼。这扔掉的不是一粒粮食，而是扔掉了劳动人民的感情。一个人如果对劳动人民的成果不知珍惜，是很难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经过一段劳动，我又被调到开原县，修清河水库。以后

又修大堤、建楼房、种地。总之，各样的活都干过。因为我想着我劳动一段时间后还要出去做教师，所以我还坚持学习专业。

我对我的要求是严格的。我觉得，做人的原则应该是自尊、自重、自爱、自强。自尊就是为了人的尊严，不能在任何情况下，轻易丢掉自己的人格。自重就是处理任何问题应该慎重、仔细，不能成为随风倒的墙头草，或无根的浮萍。自爱应该是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的身心保持健康，在生活中摆正自己的位置。自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应该是自强不息的。一个青年人应该有一种决心，用自己的劳动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刻下一道痕迹，对后代人有所教益。这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价值。如果遇到一点事情就颓废了，悲观了，甚至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那是不应该的，也是弱者的表现。

我把巴甫洛夫的名言“原谅自己，就是堕落的开始”，写成条幅，贴在墙上。由于我的表现，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就摘了“右派”帽子，解除了教养。

我是一九五六年结婚的。可我成了右派以后，曾经和我“海誓山盟”的妻子，向我提出离婚，我感到很突然。但我又一想，没什么，大丈夫何患无妻，既然不能给你幸福，我还你自由。当时我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我想要，可是当时法院那位同志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说：“你是右派，要什么孩子！”我心里想，难道右派就不能要孩子吗？就这样我妻离子散了。摘了帽子后，我满怀希望地走向新生活的道路。可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使我很痛心。我想教书，可没有一个学校要我，一听说右派，人人都是避而远之。我曾经偷

偷地去看孩子。可保育员对我说：“这孩子的爹是右派、反革命，死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人们说我已经死了，死了的人何必再出现呢？孩子才四岁，不要因为我的出现给他幼小的心灵上造成伤痕，更不要因为我而受牵连，我忍痛地没暴露身份，怅然地离开了托儿所。

当时，我母亲在金县靠给果园糊包苹果用的纸口袋维持生活。老母亲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当然希望我能留在她老人家身边。但我这样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怎么能忍心叫年迈的老母亲养活我呢？我要工作呀！尤其使我难以忍受的是邻里们投在我身上的白眼，这比鞭子抽打还难受。人是有自尊心的。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时，他们称赞得可亲热了，什么“有出息呀”，“考上大学啦！”甚至连我的样子都好象特别好看了似的。可是当我被打成了“右派”再回家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口气了，“你看，还是大学生呢，连个工作都没有！”庸俗的偏见和市侩的哲学，有时很能伤人。我痛切地感到，家乡虽好，却无我立足之地。怎么办？走！男子汉志在四方嘛。“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难道伟大的中国就没有我曲肱立足生存的地方吗？我不相信！就这样我流着眼泪告别了母亲，离开了家乡，登上开往北方的列车，一下子就到了火车道的尽头——嫩江。

下车以后，我就向兴安岭里走去。在兴安岭脚下一个农场安下身。农场人问我：“你能干什么？”我说：“我什么都能干！”他们说：“我们这有一群野马，你能不能驯服它们？”我说：“行啊。”反正我原先是个运动员，三十来岁，手脚也灵活，驯马没问题。从此，我就成了嫩江草原上的一名牧马人。在那大草原上，骑着野马，鞭子一挥，也是心旷神怡

的。

我是学心理学的，我知道动物的心理和人的心理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就其活动规律、反应方式来说，有其相同之处。所以，我按照我学过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原理，来训练这些马。每当放牧以前，“啪、啪”甩两鞭子，完了就进行下一步行动，时间长了，这鞭声就成了下一步行动的信号，收工的时候也是这样。长时间的训练，效果很好。另外和马在一起，也是有感情的。所以，当我看到我训练的马，一匹匹套上爬犁、套上车开始使役的时候，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我总觉得，不论在政治上说我什么，我用我的双手训练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马，我觉得我活着也是有意义的。这样一高兴，春节时我就写了一幅对联，贴在马圈的门口。这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为壮马站槽头哪怕披星戴月
垦荒地种五谷何惧饮露餐霜
横批是：乐在其中

真的是乐在其中，我精心地饲养这些马，从不欺负它们，而它们也从不因为我是“右派”就乱踢我，彼此和平共处，一同奔驰在祖国广阔的草原上，也确实是一种欢乐。

没想到，这幅对联被传开了，一位领导找到我说：“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我说：“是啊。”他问：“你能不能教书？”我说：“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就是学教书的。”他说：“那好，咱们大草原有十多个孩子，你教他们吧。”我

说：“我是右派身份，恐怕不合适。”他说“没关系，咱们这里‘山高皇帝远’，能教就教吧。”现在看来这个同志的思想是很解放的。不过他很坦率地又补充了一句，“你别说错了就行。”从此，我当了教师。

学校的条件比较简陋，只有我放马住的一间茅草房，找了些木板一钉，高点儿的是课桌，低点儿的就是板凳，用块铁皮涂上墨汁，就是黑板。开学时，来了十三个孩子，根据实际程度，分了五个年级。学校条件虽然简陋，上课却是很正规的，教学也是很认真的，我一人担任这五个年级的课，是很辛苦的。除了在课堂上课外，我还领孩子们到野外去上课。后来在我们地区学校的统一考试中，我教的这些学生以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绩向祖国作了汇报。我很激动，我觉得在这一片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为开垦孩子们的智力，我尽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六五年我被遣送回辽宁，据说象我这样的人不适合在边疆地区工作。到了辽宁以后，把我安排在公安厅的一个劳改场教小学二年级。由于我积极工作，所以被同志们选为优秀教师。可是领导不批，说：“右派不能当先进工作者。”

“不是摘了帽子吗？”“摘了帽子也不行。”言外之意就是摘了帽子也是右派。害人的形而上学呀！可以说，凡是得了左倾顽症的人，没有一个不在认识论上患有形而上学并发症的。至今这种“并发症”仍然死缠着一些不肯学习、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对党的改革方针怎么也弄不明白的“九斤老太”！这些“九斤老太”，压抑人才，阻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把他们掌管的那一摊工作搞得冷冷清清，实在是我们事业的绊脚石！这样的人在台上空讲马列主义，八十年代的青